

# 关于宋濂诗论中“良师友切磋指点论”的探讨

胡浙平

(浙江科技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 杭州 310023)

**摘 要:**宋濂明确提出作诗需要有“良师友切磋指点”,并把它上升到作为一个诗人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这既是对前人实践的总结与理论的提升,也是他自己从师、为师、交友的经验体悟。现着重探讨他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渊源与内涵,并阐述其意义。

**关键词:**古代诗歌理论;宋濂;良师友切磋指点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8798(2011)05-0337-08

## On Song Lian's viewpoint on writing poems: Communication among good teachers and helpful friends

HU Zhe-ping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Song Lian proposed that writing poems needs communication among good teachers and helpful friends, and regarded it a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to a poet, which is either the promotion to the summary and theory of the predecessors' practice, or the experience from his teachers, students and friends. The origin, connotation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viewpoint are present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ancient poem theory; Song Lian; communication among good teachers and helpful friends

宋濂的诗歌在明代文学史上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笔者以为一是由于留存下来的诗作不多,远远少于他的散文的数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诗歌的传播与影响;二是他在散文方面对于朱明王朝开国伊始的贡献和其后所产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朱元璋屡屡称其为“开国文臣之首”,而此后人们的注意力也往往多半放在了他的散文之上。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于其诗歌与诗歌理论的探讨与评价。其实,他自己就说过“自汉魏以至于今,诸家之什,不可谓不攻习也,缙绅先生面前,亦不可谓不磨切也”<sup>[1]207</sup>,而对于诗歌理论,则更是自认为“论诗颇谓有一日之长”,“知诗决不在诸贤后”<sup>[1]206,609</sup>。为此,笔者曾于2010年

在浙江浦江举行的宋濂诞辰7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以《略谈宋濂的诗论及其诗歌》一文,探讨其诗及其诗论。文中,笔者引用了宋濂关于“五美云备,然后可以言诗”的观点,并认为“五美”兼蓄了诗人的才识、学养、创作态度、外物感触,论述简洁而又涵盖广阔,并且,已经涉及诸如“究其施”“择其精”“浅深”“性灵”等这些有关诗作的品位与情感问题,反映了宋濂对于诗人素质和诗歌创作的深刻见解。笔者认为宋濂在理论上提出“良师友切磋指点论”(以下或称“师友论”)并视之为“可以言诗”的必备条件之一,很有见地,因而还有进一步展开探讨的必要。

## 1 宋濂“师友论”的提出

宋濂在《刘兵部诗集》序里写道:

“诗,缘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赋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称其器;才称矣,非加稽古之功审诸家之音节体制,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师友示之以轨度,约之以范围,不能有以择其精;师友良矣,非雕琢琢磨,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验其所至之深浅;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五美云备,然后可以言诗矣。”

又认为:“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虽其格律有不同,声调有弗齐,未尝有出于五者之外也。”

刘兵部即刘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原名楚,号槎翁。《明史》有传称:“家贫力学,寒无炉火,手皴裂,而抄录不辍。元末举于乡。洪武三年举经明行修,改今名。召见奉天殿,授兵部职方司郎中”,后曾任吏部尚书、拜国子司业,“善为诗,豫章人宗之为‘西江派’”<sup>[2]</sup>。著有诗文集《槎翁集》《职方集》。宋濂序其诗集时可能没有确定的名称,也可能就叫《刘兵部诗集》。杨慎评明诗,称刘崧诗为第一。宋濂在序文里说的这五个方面,第一是基础才能,第二是揣摩百家,第三就是良师益友的切磋指点,第四是雕琢吟诵,第五是从大自然中“舒畅阙志”,获得感悟。宋濂把这五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提了出来,从其语意来看,五个方面又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而且也是他对于“古之人”的总结,认为是“未尝有出于五者之外”的,因而可说是古往今来成就诗人的规律总结。

在这一“诗序”里,宋濂还说过:“无所授受者,其制涩而乖;师心自高者,其识卑以陋”,而刘崧不仅“天分甚高”,于古人之诗“凡数十百家皆钻研考核,穷其所以言”,但对于自己的诗歌仍然不满意,“乃束书走豫章,与辛敬、万石、周浚、杨士弘、郑大同游”,“相与扬确风雅,夙夜孜孜,或忘寝食”,后来又周游全国,“刘君之诗于是乎大昌矣”。在宋濂看来,刘崧是“五美皆备”的诗人,其诗艺大增,乃离不开“走豫章”与名师友游学期间的相互切磋。刘崧自己也说过:“方五岁从祖父授书,已知大义,九岁能下笔为诗文,十六岁能挟策为童子师,即以忠信孝悌之道淑诸人,十九岁往豫章从大人先生游,廿一岁以来,凡三以诗经就试场屋。”<sup>[3]</sup>

宋濂是一贯于“崇道”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因此,他讲“师友”,必然要讲“师友之道”。关于“为师”,前人之说备矣,唐朝韩愈在其著名的《师说》中就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之谓也”。宋濂则认为“兴学在乎明经,明经在乎选傅。得良傅则正鹄设而射志定,土范齐而铸器良,声流教溢,俗转风移,反是则政堕矣”<sup>[1]253</sup>,强调了“选师”的重要和“师者”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于社会教化乃至国家治理的重要影响。在《胡仲子文集序》里,宋濂指出:“古之君子,其自处也高,其自期也远,其自视也尊,其择师与友也审”<sup>[1]1506</sup>。”审者,谨慎、细致之谓也。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良师友”呢?宋濂的标准当然首先是“道”,是那些具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人。他说,读书学习“必也学为圣贤有用之学,达则为公为卿,使斯道行;不达则为师为友,使师道明”<sup>[1]107</sup>。为师为友,不仅自身要“道行”高尚,能够担当起为人师表的重任,而且要“明道”,身体力行地传“道”布“道”,让“道”流四溢。至于“友”,自然也包括“师”,但表述时又常常指“学友”或意趣相近的文友、诗友,在这方面,宋濂常常推崇那些不欺贫、不自高、肯刻苦、能勤奋而又“道行”甚正的人。比如像东阳蒋季高,“恂恂儒者,非其道弗言也,非其道弗为也”,“交朋友,则信而贞”,蒋氏当年曾与宋濂一起游学于黄潜门下,宋濂“甚敬之”,佩服其“笃于学”,“日出所为文,皆雅驯可传诵”,“每一会绣湖上,辄握手吐肺肝”,自己回青萝山时,也曾期望“折简招之,或可一来,当共饮水哦诗,或投壶白云

间”,可惜因为年仅29岁就英年早逝,成了宋濂心中的一大遗憾<sup>[1]258</sup>。再如江夏詹同文,“襟韵潇洒”,具“雄博之学”,宋濂自谓与其“交且久”<sup>[1]482</sup>。又比如同为浦江老乡的郑仲涵,好读书,为子尽孝,为兄弟以悌,为人以义,为事尽责,为友尽诚,宋濂比其年长,“读书浦阳山中”,郑氏从游“先后十有余年”,宋濂自称“义则师友,情如父子”<sup>[1]98-250</sup>,等等。如此,已不难看出宋濂对选择“良师友”的衡量标准了。

## 2 历史上“师友论”的简要追溯

诗歌理论总是离不开对于历史上诗歌创作现象的归纳与提炼。作诗需要“良师友的切磋指点”,就是宋濂对于古往今来的文坛上所以能够成就诗人的规律总结。因此,有必要先简要追溯一下宋濂以往诗坛上的这一现象。

纵观历史,大凡人的成才,无师自通者固也不少,但绝大多数人却都离不开投师问友。师友之道,自来远矣。《诗经》有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朱熹的解释是“匪,斐通,文章著见之貌也”,“治玉石者,既琢以锤凿,而复磨以沙石。言其德之修饰、有进而无已也”<sup>[4]34</sup>。引申开来说,就是要经常地切磋、琢磨,才能深湛学问,提升道德。《诗经·小雅·鹿鸣》是一首宴饮之歌,也是宴友之歌,故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吹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待朋友如贵宾,音乐悠扬,使宾至如归,朱熹认为“言其礼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sup>[4]99</sup>。《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也说“南有嘉鱼,蒸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前面两句是起兴,后面两句,朱熹解释是“君子有酒,则必与嘉宾共之,而式燕以乐矣。此亦因所荐之物,而道达主人乐宾之意也”,同样说的是对待朋友之道。

一部《论语》,更是展示了师生之间的平等讨论,甚至可以称之为“师生讨论集束录”。孔子自身知识渊博,熟知古代文化,但仍然强调博学、好问,主张拜人为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sup>[5]72</sup>。孔子要求广泛交友,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sup>[5]1</sup>提倡“以文会友,以友辅仁”<sup>[5]132</sup>,通过交朋友来增长知识,提高品德修养的水平与境界。同时,孔子要求交朋友要有选择,交益友,不交损友,所谓“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sup>[5]175</sup>。孔门设教,弟子各有所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sup>[5]110</sup>。这里的“文学”,指的是古代文献,当然也包括《诗经》,广义地说,也有“诗学”。他的“诗学”,师生之间对于《诗经》的学习、讨论、批评,是时常见之于《论语》的篇章的。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则主张“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同样是倡导“师友”的。甚至可以说,先秦诸子也都是当时一代师友的可贵实践者,其流风所及,直染后代。

汉魏诸士人,“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铁材,发绮毂之高喻”<sup>[6]672</sup>,堪称彬彬之盛。曹操父子及以他们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更是经常聚集在一起喝酒咏歌,以此来增长其诗艺,所谓“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sup>[6]674</sup>。此后的大诗人陶渊明,则在其诗歌里明白无误地说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跟他一起切磋诗文的,其中虽然不见得有专指意义上的老师,但都是能够剖心剖肝的朋友,却是可以肯定的。

唐代是诗歌创作极其繁荣的时期,诗人之间经常宴酒吟诗,品题讨论,师承、祖述,以至于诗坛流派众多,诗作繁富。陈子昂是唐初首先举起诗文革新大旗的人,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就称他是“轻财好施,笃朋友之义。与游英俊,多秉钧衡”<sup>[7]12</sup>。李白、杜甫是唐诗的两座高峰,创作风格不同,但他们同为诗友,无形之中互相影响。他们也都以前人为师,自铸伟词。李白曾称“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杜甫是“不薄今人爱古人”,主张“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诗”<sup>[8]</sup>。元慎与白居易多有诗作往还,诗风也相近,人称“元白体”。元慎自己就说过“慎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以相投寄”。又说:“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酬答。”<sup>[9]</sup>其酬答的过程,也就是相互影

响、共同提高的过程。晚唐诗人贾岛,在“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诗句中用“推”用“敲”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韩愈说用“敲”好,贾岛就用了“敲”,后来,就因为这“一字师”,贾岛和韩愈还结为了“布衣交”<sup>[7]93</sup>,也可称作是“良师友指点”的一大范例。唐诗的繁荣,还与当时的科举制度有着很大关系,由于入仕要考诗赋,故诗人们诗成之后交人指点,乃至在考试之前先送给考官过目求教则所谓“温卷”,其中当然免不了后来有给予指点修饰的,这不仅是当时的一大风气,也颇能见出“良师友”之间的切磋指点对于唐代诗歌创作的推动作用。

宋代诗坛,继唐而兴,诗派腾踊。师友或诗人之间,相学相长,蔚然成风。《澠水燕谈录》就曾有记载,说宋初诗文革新领袖欧阳修“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汝士、王复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磋”<sup>[10]</sup>。欧阳修自己也有诗说“缅怀京师友,文酒邀高会”。欧阳修对于后进的提携与奖掖,对于后进诗文的指点与宣传,也都成了诗苑文坛上的美谈佳话,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与他有交往,“三苏”还是因为他而闻名天下的。大文学家苏轼继承了乃师风范,诚心指导学生,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张耒、秦观、陈师道、晁补之,还有黄庭坚、李方叔,合称“苏门六君子”,他们不仅政见与乃师相同,就是作诗也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敢于开拓,别成名家。钱谦益在为《苏门六君子文粹》作序时曾说到李方叔,指出:“方叔少而求知,事师之勤渠,生死不间。”<sup>[11]180</sup>李方叔专门作有《师友谈记》,记载与苏轼的交往和见闻。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宗主,这个有声势的文学流派,如果以黄庭坚作为创始人算起,到方回替江西派做出总结为止,其间师友、门生辗转传授,其活动竟前后持续了二百多年<sup>[11]217</sup>。南宋时期,诗人中相为师友的作家也是俯拾即是,如吕祖谦与陈亮、叶适,陆游与范成大,辛弃疾与陈亮,“永嘉四灵”,“江湖诗派”,等等,都是以诗作相往来,酬答之中互为影响,切磋之中共同提高和进步的。

宋亡元兴,由于多种原因,元代的诗坛固然不及唐宋,可能相对有些沉寂,但是,诗人之间的师友切磋与相互指点,倒也是当时学风的一大特点。姑且不谈别的人,即使是宋濂在元代时与他的老师们,也是常常谈诗论文,相互切磋。徐永明先生的《文臣之首——宋濂传》<sup>[12]</sup>的“转益多师”一节已论之颇详,笔者也将在下文专门谈及。其风所延,直及明代。单是宋濂与刘基这对明朝初期文坛上的“双子星座”,就常在一起讨论诗文,也有诗作往来。宋濂与他的得意门生方孝孺之间,师友相挈,言诗言文,说经论道,也是令人称道的文坛佳象。身跨元明两代的刘崧,对于师道就多所看重,他在《与王高书》<sup>[3]</sup>中即指出:“仆闻之,去古远,世类不如古,独学者,犹必有师”,“非惟童稚也,虽凡民,一技一艺之微,亦必惟其师之是听,而不敢少有戾焉”。还接着作了如下一番议论:“得师则通,否则蔽;得师则明,否则昧。是道也,无贵贱、贤愚、少长,咸习师之,所习言师之所言,行师之所行;遑遑焉,惟恐跬步之不逮而或后也;孜孜焉,惟恐纤毫之不竭而或隐也。下至歛衽之操,锻炼之攻,与夫黻黼之执,不只穷尽夜、竭筋力以徇之。故为子弟者必求以齐其师,而师亦乐以成其子弟。”把为师及师道之重说得明白而透彻。在送别友人张万中时刘崧也曾论及张氏的师友之道。当年,刘崧曾与张氏同“从先师邓子益氏游”,觉得张氏虽然为官出仕,但犹“倦倦师友之厚道”,称其“志于学而善用者也,又能笃于师友之道”<sup>[3]</sup>。他自己的诗歌创作自然也是多得益于“良师友”的切磋与指点。他的这些观点,也许是宋濂在为其诗集作序前也有所了解的。

综上所述,宋濂的“良师友论”,正是对于其之前及同时代诗歌创作史上这一现象的一个总结与理论的提升。

### 3 宋濂的老师对于其提出“师友论”的影响

宋濂提出这一观点,又是以他自己求师从师的实践作为其理论的一大依托的。他一生曾经直接拜过四位老师,这就是闻人梦吉、柳贯、吴莱和黄潛,其中柳、吴、黄三位还都是元代的著名诗人,因此,宋濂跟他们研读“六经”,也学习诗文的写作,这些老师的思想观点、文学创作对于宋濂的影响是很大的,自然也包括他们的“师友论”。

先说柳贯。柳贯的出生地在今浙江兰溪,其家乡当时属浦江。他的诗文中大量的“谈师论友”的思

想,说“文士相长之乐,殆亦造物者之所深靳”<sup>[13]374</sup>,认为师友切磋乃与生俱来,本就是诗人快乐生活中应该有的一部分。他的《答金华宋景濂书》,开头即称宋濂为“贤良契友”,并云“翰撰友兄”,这固然是古人在书信往来之间惯用的谦语,但宋濂在柳贯的心目中确实别有地位,柳说:“前者所睹诸文,皆雄浑可爱。不肖阅人多矣,后进求如此者未见其比,为之喜而不寐。吾乡文献,浙水东号为极盛,自惭弩劣不负荷此事,后来继者,所望惟吾友尔。吾友以绝伦之识,济以精博之学,若更加工不已,驾风帆于大江之中,孰敢御之哉?”<sup>[13]280</sup>对宋濂的才华、学识赞誉有加,期望深长,而宋濂则称柳贯“孝友本乎天性”,自己“受先生之教为深”<sup>[1]120</sup>,所以,两人之间,本身就是良师益友的关系。柳贯还有诗说是“过林倘肯频纤辙,剪烛犹堪语夜终”<sup>[12]127</sup>,相契之深,可见一斑。柳贯的师友之教,自然对宋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柳贯自己曾经师从宋末乡贤方凤,方凤死后,柳亦多有诗文感忆,其中有诗句说:“重予师友义,黽勉承记录。”<sup>[13]161</sup>在《徐凤谥文庄》一文中,柳贯则指出:“儒者事业,蕴之则为德行,发之则为政迹词章。此其服袭于家庭诗礼之训,而渐濡于师友源流之正者,有自来矣。”<sup>[13]166</sup>明确指出了其家教与师友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巨大作用。在《李潯谥端宪》中也说:“兄弟同世,固本天常;师友一门,实备家训。”<sup>[13]9</sup>他还常常与其他朋友论诗谈道,“里中四三友,论交常莫逆”,“席间有佳友,来来千里屐”,“斯文千载后,泮涣抵离析”<sup>[13]10</sup>,“自我入西邕,群士日参会”,“旧学待表微,新声行起愤”,说的也都是师友相聚时那种侃侃谈诗、纵横论文的愉悦与获益。

再说吴莱。吴莱字立夫,号渊颖,浙江浦江人。吴莱是教育家,也是文学家,王士禛论诗,将其与杨维禛并列,曰:“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他们在相对沉寂的元末诗坛上可以说是雄风在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与黄潛、柳贯并受业于宋方凤,师友渊源,具有授受”。吴莱在《白云先生许君哀颂辞》中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考其师友渊源之所自来,君(指许谦,婺州金华人,字益之,人称白云先生)信可谓得夫师道之重矣!”<sup>[14]141</sup>这里的师友,当然是指他原先曾经师从、交往过的老师或朋友及他的学生们。吴莱学诗也注重师友切磋,他在《夜观古乐府词,忆故友黄明远。明远曾作〈乐府考〉,录汉魏晋宋以来乐歌古诗》一诗中说“予方弱冠学讴歌,去问诗骚法如何”<sup>[14]32</sup>,师友黄明远就引导他学《诗经》、学乐府,这对于后来吴莱的诗歌创作是起到过帮助作用的。宋濂作为他的学生,吴莱与他的交往颇深,他在写给宋濂的诗歌里就曾叮咛周至:“问子何所学,将通鲁《春秋》”<sup>[14]47</sup>,在讲解“六经”的同时,也指导宋濂读诗写诗,所谓“诗宗鹤膝蜂腰体,礼象龙头豕腹图”<sup>[14]35</sup>。宋濂自己也说过,他是向吴莱学诗的。

黄潛是元代的诗文大家,字晋卿,浙江义乌人。黄潛有言:“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务学而求师。”<sup>[15]123</sup>又说“始予弱冠时学为诗,同郡柳道传、王申伯、陈茂卿、方子践、子发皆以能诗称者”,“凡予所与游与居,而以文字相娱乐者,又一时之人物矣”<sup>[15]201</sup>,回忆当年师友共同切磋诗艺,感叹如今亡故者多。黄潛也是师从方凤的,自言“游先生门最蚤”<sup>[15]128</sup>。又说过曾与一批朋友在聚星楼,“虽无车马仆役之盛,而有琴书殇咏之适”<sup>[15]403</sup>。他称信州路总管府判官谢昺孙,“善与人交”,“遇风日清美,辄与胜流韵士酣嬉于水光山色间。所为诗,直以写其胸中之趣,不苟事藻饰求媚俗也”<sup>[15]450</sup>。宋濂是黄潛的得意门生,宋濂《跋黄文献公送郑检讨序》劈头就说:“自古师、弟之间,不翅亲父子,然传所谓父生之、师教之,其义,诚一也。”<sup>[1]</sup>宋濂的诗文总体上是温文尔雅,这与黄潛的影响不无关系,他的《书刘生铄歌后》有云:“先师(指黄),和平渊洁,不大声色,而从容于法度。是以宗而师之者,虽有高下浅深之殊,然皆守矩蹈规,不敢流于诡僻迂怪者,先师之教使然也。”<sup>[1]</sup>这段话与其“师友论”可以说是同义表达。宋濂还在为黄潛所作的《行状》里指出:“(先生)遇佳山水,则觞咏其间,终日忘去,其冲旷简远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顿消。”比如黄氏的《过永康桃岩》:“立石平如削,飞云近可梯。莫穷千古胜,但惜众山低。灵草经春长,珍禽隔树啼。人言旧朝士,感事有留题。”<sup>[15]52</sup>又如《山水图》:“老树无荫石有棱,乱山高下白云层。梦中犹识江南路,惟恨舟人唤不应。”<sup>[15]98</sup>吟咏再三,还真有些“和平渊洁”、“冲旷简远”的风致。

至于闻人梦吉,他是宋濂的启蒙老师。义乌王子充称其“幼有异质,学知向方”,入当时定庵、柏崇等先生之门学经习道,“自为师友,夙夜磨切,所资日深”,“设教,先道德而后文艺”,其去世后,就是由宋濂等学生私谥为“凝熙先生”的<sup>[16]</sup>。宋濂则云“以淳庞之资,卓绝之识,屏去流俗凡近之见,期造正大高明之庭”,

“由其渊源深而培养厚,故其功用茂而运量弘”,“守道之笃,独立弗迁”<sup>[1]230</sup>。宋濂自幼勤读,早慧过人,相传七岁便能作诗,人目其为“神童”,连同后来的文学成就,与闻人梦吉对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 4 宋濂自身对于“师友论”的实践

宋濂的一生,相当一段时期也是在为师授徒中度过的,晚年甚而至于还担任了明朝国子监和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太子的老师。《明史》列传记载:“是时帝(指朱元璋)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王辉等数十人,择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人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sup>[2]3785</sup>,后来因为胡惟庸案子牵连到长孙宋慎而受株连,“帝欲置濂死,皇后(马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在今四川省)”<sup>[2]3787</sup>,直到病故于夔州。

元至元、至正年间,宋濂从金华潜溪搬迁至浦江青萝山麓,过的就是边潜心读书、边教书授徒的生活。元至正年间,也曾有人举荐宋濂入朝任编修,但他以“亲老”为由拒绝受荐,而入家乡浦江仙华山与其弟子读书论学,并著成了《龙门市凝道记》二十四篇。后来,因为朱元璋征召而入明。

在师生关系上,宋濂善待学生,诲人不倦,学生也事之如父,宁海人方孝孺就说他是“友千古之豪杰,待知己于后世”<sup>[1]2300</sup>。反之,宋濂也非常看重方孝孺,常常与其谈经论道,切磋诗文,他在《送方生孝孺还天台诗有序》里就这样写道:“古者重德教,非惟弟子之求师,而为师者得一英才而训饬之,未尝不喜动颜色。此无它,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己也。予以一日之长,来受经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虽繁繁,不如萑稊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孝孺,其为人也,凝重而不迂于物,颖锐有以烛诸理,间发为文,如水涌而山出。喧啾百鸟之中,见此孤凤凰,云胡不喜!越一年别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sup>[1]1961</sup>诗中有“不禁秦淮水”,“共穿钟阜云”,“明年二三月,萝山花正开”这样的句子,可见是作于京师并将在次年致仕之时,这是诗序中的一段,虽只一百五六十个字,但由古而及今,意深而情长,把师友之谊提到了“德教”和“天理、民彝”的高度,并说自己的学生很多,可惜“散落四方”,甚为思念,而近在眼前的方孝孺,人品、才华两相高,称得上是百鸟之中的“孤凤凰”,师生相遇,大喜过望,如今一别,不禁感慨万端,思而不止。为此,他写下了十四章共五十六句的诗歌作为送别,其实也是以诗论学,其中有云“群经耿明训,白日丽青天。苟徒溺文辞,萤爝欲争妍”<sup>[1]1961</sup>,尽管字面上是论学,包括学《诗经》,但是也不妨看作是老师对于学生作诗的一次“良师友”的直接指点

宋濂善待师友,师友则敬重宋濂。他在《徐教授文集》序中道:“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赋资绝伦,自少学文,即期以载道,非六经所存,不复轻置念虑于其间,含绩既久,烨然以文名江南。”回忆自己在朝廷时“每与大章论文”,“大章深以予言为善”<sup>[1]1962</sup>,师友之情,溢于言表。

宋濂讲学论学,向重崇经明道,但也不废古今人之诗歌,他在《杏亭摘稿》序里便说过:“濂方将膝置东明山中,与二三子共学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愿观之,俾濂摘其古今诗若干篇,楔梓以传。”<sup>[1]1252</sup>可见,师生共学期间,也是要学习讨论“古今诗”的,这就免不了对于诗歌的切磋指点了。

#### 5 宋濂“师友论”的现实背景及理论贡献

经历了元蒙统治时期对于儒家文化的或弃或忽及元后期社会的动荡战乱,醇深雅正的“古道”之风也在某些方面遭受破坏,对此,宋濂是深有所感的,因而他不止一次地指斥过“师道之失”的现象,比如,他入明以后还说过:“予私自念,近时为师弟子者,一转盼间如不相识然。”<sup>[1]74</sup>他感叹:“道隐民散久矣!朝执经于讲帷,暮反眼相视若途人者有之。”<sup>[1]1259</sup>这都是宋濂对于“师友之道”漫然丧失的沉痛之感,也可以说是他提出“良师友论”的现实背景之一。

宋濂在《孙伯融诗集》序里也说过:“诗道之倡,其有诗友渊源乎?非师不足尽传授之秘,非友不足成相观之善,无是二者,不可以言诗也。”<sup>[1]1253</sup>联系前面所述可以看出,提出“良师友切磋指点”方可以“言诗”这

一重要观点,既是宋濂对于前人的总结与提炼,也直接继承了他的老师的思想,同时又有自己与学生共同论诗的体验。但是,更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理论的概括,尤其是把它放到成就一位诗人所需条件的大系统里,明确提出这是作为诗人的必备条件,这的确是具有创造性的。

以往的“师友论”,比较相近的是宋人张表臣在《珊瑚沟诗话》里的一段话:“古之圣贤,或相祖述,或相师友,生乎同时,则见而师之;生乎异世,则闻而师之。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颜回学孔子,孟轲师子思之类也。”把“师友”分成“见而师之”与“闻而师之”两类,不过,张氏更多的是在讲“祖述”即“闻而师之”,故在下文又举了颇多的例子,并指出:“未能祖述宪章,便欲超腾飞翥,多见其嚆错而狼狈矣”<sup>[16][450]</sup>。就以此所引而言,仲尼属于“生乎异世,则闻而师之”,颜回与孟子属于“生乎同时,则见而师之”,仲尼为“祖述”,颜回、孟子乃属于“师友”。因此,宋濂的论述,比起张表臣来,更为直接,点明它是属于成就一位诗人所必备的要素之一,也显得更为明了,从而也更具理论意义。

至于宋濂说的“非良师友示之以轨度,约之以范围,不能有以择其精”,是顺着上文“非加稽古之功审诸家之音节体制,不能有以究其施”一段而来的。“音节体制”,讲的是音声节奏,用韵择调,其“施”在于传情美听,而“轨度”“范围”,则主要是指诗歌的作法与规矩,强调的是诗歌的谋篇布局与汰粗存精。在宋濂看来,诗歌篇幅有限,因此,造语用句既不能是一味地简省,也不能是冗长啰嗦,体现的是诗歌用语上的简练精准和篇幅上的精当灵巧。这也是前人论诗常常言及的。比如,最早以“诗话”命名的欧阳修《六一诗话》言钱惟演联语的“警绝”及“好句尤多”,石曼卿的“诗格奇峭”等<sup>[17]270</sup>。又如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sup>[17]406</sup>,又说“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巧,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sup>[17]430</sup>,说的就是诗歌的格律与用语。张表臣也说“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乃得工耳”,而且也讲到要“择精粗”“知瑕瑜”。说“精粗不可不择也,不择则龙蛇蛙蚓,往往相杂矣;瑕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则琼杯玉卮,且多玷缺矣”<sup>[17]454</sup>,也是说作诗要讲究遣辞造句,选材谋篇。宋濂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把“良师友”的切磋指点归结为并且落脚到作诗的“轨度”与“范围”,不仅显示了他论文用语的简括与精当,而且对于诗人尤其是年轻后学者来说,有良师友的指点,“尽传授之秘”,“成相观之善”,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及早进入创作“状态”,乃至主动地加以“择精粗”,这不能不说是学习作诗的良法之一,也不能不视之为是评价诗歌高下的标准之一。宋濂在回忆自己向吴莱学习作文时还曾说过:“濂尝受学于立夫,问其作文之法,则谓有篇联,欲其脉络贯通;有段联,欲其奇偶迭生;有句联,欲其长短合节;有字联,欲其宾主对待。又问其作赋之法,则谓有音法,欲其倡和阖辟;有韵法,欲其清浊谐协;有辞法,欲其呼吸相应;有章法,欲其布置谨严。总而言之,皆不越生、承、还三者而已”<sup>[1]2180</sup>。这虽然说的是作文作赋的“轨度”“范围”,也即规矩、范式,但同样可以看作是作诗的“轨度”、规矩,比如宋濂说的“生、承、还”,记得笔者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求学时,蔡义江先生就讲过律诗、绝句的“起、承、转、合”的章法结构,回想起来,颇多回味。

需要指出的是,宋濂的“良师友论”与一般意义上的“师承关系”虽然有重合之处,但也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如前所述,师承,可以是直接授受,也可以是不同时代之间诗人们的“祖述”,而且往往指的是后者,用宋濂的话来说:“举天下无足嫌吾意者,则求古人之贤者而师友之。”<sup>[1]1506</sup>这一点,宋濂的《答章秀才论诗书》一文就有比较详尽的论述,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阐明了历代诗人的“祖述”“效仿”,因此,劈头就说自己不赞同章秀才“疑历代诗人皆不相师”的观点,然后从《诗经》一直说到两宋之末,认为“诗之格力崇卑,固如随世而变迁”,但不能得出“其皆不相师”的结论,只是觉得“所谓相师者,或有异”而已,“其上焉者师其意,辞固不似,而气象无不同;其下焉者师其辞,辞则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尝近也”<sup>[1]207-210</sup>,说的其实就是诗坛上屡屡言及的“师承关系”或者前文说的“祖述”现象。而宋濂在这里提出来的“师友论”则主要还是指当时代“师友”的授受、点拨,这无论是时代情绪的相互感染,还是作诗的章法、句法,亦或是用韵定声、感情表达,其对于学习作诗者的优越性,恐怕也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于诗坛的繁荣,前文也已论及,则从除了需要诗人自身的不懈创造之外,恐怕也还是需要师友的及时指点与热情推广宣扬的。当然,师友的指

点也可能造成诗人新的拘束与阻碍,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此不赘言。

6 结 语

总之,宋濂提出“师友论”,既继承了前人的丰富思想,又受到了他的老师的直接影响,同时,特别是以自身的实践,结合当时的诗歌创作,且带进了浓厚的时代情绪,阐发了其对于诗歌创作的功用。由此而论,宋濂的“师友论”及其理论意义,是值得珍视和探讨的。

参考文献:

[1] 罗月霞.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两淮马裕家藏本.槎翁文集[M].嘉靖元年刻印本影印本.

[4] 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 杨伯俊.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 辛文房.唐才子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8] 羊春秋,张式铭,刘庆云,等.历代论诗绝句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9] 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 王闼.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 徐永明.文臣之首:宋濂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3] 柳遵杰.柳贯诗文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14] 吴莱.渊颖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公司,2005.

[15] 王頔.黄潛全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16] 王祎.王忠文集[M]//《四库明人文集丛刊》影印本,卷 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7]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